

艾滋病人群情感调适

的 社 会 学 研 究

侯荣庭 ◎ 著

北京玉润公益基金会出版项目

主编 潘绥铭 景军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艾滋病社会学研究丛书（第一辑）



玉润基金会

玉 润 健 康 从 书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艾滋病社会学研究丛书（第一辑）

主编 潘绥铭 景军

艾滋病人的社会学研究 群情感调适

侯荣庭 ◎著

内 容 提 要

本书采用“生病叙说”等质性研究方法,从30名HIV病毒感染者的生病体验和情感表达入手,以主体建构为视角,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等三个层面分析感染者“获得性‘需要缺陷’综合征”“获得性‘期望不足’综合征”“获得性‘惩罚泛滥’综合征”的“社会病症”困境,并因此唤醒其所存在的强度较高的负性情感及其“负性情感的鸡尾酒”形式。

本书最后从冲突与博弈、结构与功能以及系统与互动三个视角提出情感存在与呈现的动力机制及其意义,并认为这些存在的负性情感经过抑制与归因等防御机制的转化、加强与呈现,又会对微观、中观和宏观的社会设置产生影响,更可能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滋病人人群情感调适的社会学研究/侯荣庭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1
(艾滋病社会学研究丛书. 第一辑)

ISBN 978-7-5680-3626-9

I. ①艾… II. ①侯… III. ①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病人-情感-社会学-研究
IV. ①R512.91 ②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3361 号

艾滋病人人群情感调适的社会学研究

侯荣庭 著

Aizibing Renqun Qinggan Tiaoshi de Shehuixue Yanjiu

总策划:姜新祺

策划编辑:张馨芳

责任编辑:包以健

装帧设计:饶 益

责任校对:李 琴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电话:(027)81321913

邮编:430223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7 插页:2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1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96.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办好中国的事情，既要靠党和政府，也要靠13亿人民。防治艾滋病是一个复杂的医学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需要全民参与、全力投入、全面预防。要从个人健康、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的角度，看待艾滋病防治工作。

—— 2012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石榴园分中心看望艾滋病患者时的讲话



玉润基金会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助项目
北京玉润公益基金会出版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 (NJSY18133)

阶段性成果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 武汉

潘绥铭教授序

Preface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艾滋病以来，人类社会在面对这一挑战的时候，先后出现了四种不良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把艾滋病“道德化”了，认为艾滋病是对于“性混乱”的惩罚，艾滋病感染者是“咎由自取”。这种倾向在艾滋病传播的早期非常盛行，到 21 世纪开始衰亡，目前已经没有多大的市场。

第二种倾向是把艾滋病“社会性别化”，片面地强调男男性行为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渠道。自 21 世纪以来，这种倾向在发达国家日渐式微，但是在我国仍然有一定的市场。

第三种倾向是把艾滋病“灾难化”，过度夸大艾滋病传播的速度与规模，因而错误地宣扬：艾滋病传播必定会给国家、经济、社会和人民带来灭顶之灾。这种倾向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曾经流行，到 2010 年才逐渐淡化。

第四种倾向是“唯医学化”，认为艾滋病只是一种传染病，仅仅依靠医学和公共卫生手段就足以遏制其传播。这种倾向在防治艾滋病的各个领域中一直表现得很明显。

正是为了消除上述四种倾向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社会学者才获得了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历史机遇。

早在 20 世纪末，国际学者、国际组织和具体工作者就发现了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上述的前三种倾向危害较大，但是纯粹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与工作者由于学科所限很难与之抗衡，急需更加专业的人员参与进来。其二，艾滋病传播者和感染者都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的，

医疗与预防的各种工作也开展于其中；但是，同样由于学科所限，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也很难解决这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

于是，国际上开始呼吁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积极参与到防治艾滋病的研究与工作中来。在我国，这一进程开始于2000年，当时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合作开展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它不仅是当时艾滋病防治领域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而且在我国也是第一次大规模地引进社会科学家参与这样的工作，还设立了专项基金，支持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与具体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本丛书的主编之一景军教授牵头，2003年召开了第一次社会科学家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学术研讨会，其中的主力就是社会学家。

此后，在长期实践中，社会学为防治艾滋病做出了突出贡献，发表的相关论文与出版的书籍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本丛书仅仅是万紫千红之一抹，志在创立“艾滋病社会学”这个新的综合学科。

艾滋病社会学不仅是把社会学简单地运用于防治艾滋病，而且向着跨学科研究的光明前景前进。目前已经获得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公共卫生学与社会学的不同世界观与方法论开始擦出了火花，“人”的概念得以拓展，“人的主体性”意识得以推进，出现了发展数据收集方法的可能性。这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艾滋病社会学已经创建出不同于原学科的世界观。因此，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才能深入各种不同的高风险人群，了解他们的知识、态度、信念与行为，而不仅仅是“看病治病”。同样，社会学研究者基于新的世界观，开始积极参与艾滋病毒感染者治疗的实践，而不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第二，在思维逻辑上，双方也找到了具有相通之处的元命题：生理状况与行为特征是互相建构的。正是由于双方都接受了这个命题，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才会努力去探讨感染者与高风险人群的求医行为，而社会学研究者也才会不断主张把预防和治疗妇科病纳入“性工作者”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之中。

要让研究者时刻坚持对主体建构视角的运用与反思，将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方法论。

王小平、侯荣庭的研究，主要是关注艾滋病感染者面临的生存问题。获得良好的治疗自然是艾滋病感染者解决生存问题的基本前提，然而尽管获得了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但感染者未必就可以得到良好的治疗，因为感染者遭遇了至少三大困境。其一是《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的患者属地管理原则。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患者应到户籍地领药。医生也经常对就诊的艾滋病感染者说，病人应该到户籍所在地申请国家免费治疗药物。对于在外地打工的感染者来说，定期回家领药对他们的就业和经济生活都会造成负面影响；而对于一些小县城或农村的感染者来说，在户籍地领药会对他们的隐私产生极大威胁。其二是耐药性问题。在我国，免费的抗病毒治疗药物都是一线药，长期使用后会出现耐药问题，需要二线药和三线药，但其十分昂贵，而且难以获得，除非从国外邮购。其三是并发症治疗和手术难问题。艾滋病感染者一旦需要到综合医院看病或做手术，都会受到形式不一的歧视，做手术为最难之事，被拒绝的可能性最大。即便医院表示愿意为艾滋病感染者做手术，也要附带一定的交换条件。例如，这套丛书的一位作者侯荣庭写道，一名感染者希望在某地一家医院做眼科手术，大夫说可以，但要求感染者接受媒体采访，帮助医院做公益宣传，手术全程还要录像。那位感染者怕暴露身份，尤其怕身份暴露之后给自己的孩子带来社会歧视，所以冒着失去一只眼睛的风险拒绝了院方提出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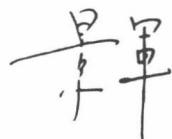
这套丛书涵盖的感染者研究从不同角度说明，尽管艾滋病感染者遭受广泛的社会歧视，但来自医务工作者的排斥有可能是最大的伤害。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连医生都恐惧艾滋病或歧视艾滋病感染者，那么普通人则更会以同样的态度来看待。毕竟在艾滋病问题上，医者的言行定义着艾滋病的社会属性标签，被污名化且附带恐惧的标签如同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周边的人们只不过是一群冷漠的围观者。从世界各地的经验来看，艾滋病感染者能够有尊严生存的前提之一是医者态度的转变。到目前，中国艾滋病感染者能够得到的尊严主要来自病友，而不是医者。在这套丛书中，侯荣

庭的研究特别介绍了一个病友组织的成长历程，可以让读者从中看到一丝维系人类悲悯情怀的希望。

姚星亮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呈现不同感染者/患者在感染、检测、就医治疗、社会交往、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真实多样性，梳理其背后的相关社会位置与问题，以及感染者/患者不同的应对策略、应对实践与其主体建构之间的关联，具体而生动地回应了社会中较为流行的关于感染者/患者的“去人化”“病态化”“日常生活抽离化”等认知倾向和刻板印象。

黄盈盈在这套丛书中就自己从2002年以来对社会性别与艾滋病的交叉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她在书中讨论的第一个主题是女性感染者如何生活、如何处理各类关系，包括感染之后对于性、婚姻以及亲密的家庭关系的想象与实践。她希望在性、性别、身体、婚姻、疾病等多重交叉关系中将艾滋病议题从医学空间拉回生活空间，凸显出身体及亲密关系的在场。黄盈盈在书中讨论的第二个主题是人口流动与艾滋病感染风险的关系，具体涉及往返于城乡的男性农民工以及生活于跨境空间的加拿大中国移民。在已有的与艾滋病相关的文献和报道中，男性农民工因为远离家乡、大部分为青年单身或者妻子不在身边，往往被认为更有可能与性工作者接触，且因为其相关知识缺乏，所以具有更高的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黄盈盈认为，这些论述所依据的生活现实并不可靠，因为研究者往往忽视不同农民工的工地生活（尤其是钱的管理、日常作息、休闲与老乡关系）、如何谈性（不限于，但是包括找“小姐”）以及对于性病、感染艾滋病的看法，因而未能从多样化的声音与谈论细节切入，走近农民工在工地的日常生活，并在他们的生活中理解其对于风险的认知与建构。相较于农民工，加拿大移民在社会阶层、跨境生活以及性实践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基于差异性的考虑，黄盈盈主要依据一名男性的跨国异性性经历、一名女性的跨裔异性性经历以及一名男性的跨国跨裔同性性经历，纵向地展现受访者对于加拿大生活以及来往于中、加之间的经历的描述，在跨国流动的背景下讨论受访者对艾滋病、性健康方面的认识，进而批判性地检视以往研究对于人口流动与风险的认识框架及其背后的假设与逻辑。

总之，潘绥铭等学者为这套丛书付出了相当多的心血。读者也应该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毅然决定出版这套丛书的勇气。没有学者们的付出，这套丛书将难以成形。没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丛书内容也就只能在有限的学者圈内分享。二者的努力都令人敬佩。



2017年7月28日

v

景军教授序

言之有物(代序)

Preface

在指导研究生写论文时，我的基本信念为：学生必须先有东西，然后才能写；而动笔写则必须有理论思考来支撑，才写得下去。我要解释这信念里的两个重要概念——“有东西”（有物）和“有理论”（有言）。

学生如果自称是循规蹈矩跟着学制一路读上来的，在课程和功课之外别无其他，这样的学生通常不会被我们的研究所选上。反过来说，选进来的研究生一定有些值得讨论的人生经验——自身的经历，或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历练。这样就叫“有东西”（有物）。接下来要动手写论文时，要有什么理论（如何言说）？我是个信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读书人，如果在我面前只会读死书，不能进入问题讨论状态，那么这样形成的师徒也不可能长久。我说的“理论”是个动词，能理能论才是能言的本来面目。但在开始理论时，我们一下子就会陷入思想的历史洪流——我们会进入浩瀚无涯的文献世界。

2013年春，我收到一条信息，说是有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要来辅仁大学心理系攻读“双联培养博士学位”。我大致了解了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之前的工作状况，以及在人大入学后的社会学学习状况，先和这名学生通了几次信，经过审慎评估，决定让他来试试。我们的博士生一般都需要花五六的时间才能修完课，加上写论文的时间，博士班读个七八年是很常见的现象。2013学年的开始是在暑假过后，我见到的这名学生就是侯荣庭。他能用的时间只有两个学年。

他除了像普通博士生那样按规定修课之外，还把我在每一学期内所开的三门课全部当成他要修的课，包括本科生的一门选修课，以及研究所硕士、博士课程各一门。总之，他抓紧一切时间，全面学习，每周会有三次

在课堂上碰面的学习。我给各门课开出的指定读物确实包含一些很先进的理论，譬如“关系论的精神分析”，也包含一些很经典（但永不过时）的题材，譬如“精神生活”。读 20 世纪 90 年代后在美国兴起的许多学者精深的作品，没有中文译本；读宋代哲学家写下的文字，不可能用白话文。很多学生的学习态度，跟荣庭比起来，我必须承认，要数荣庭最认真。所以，很快地，我发现这是个有东西也愿意有理论的学生。

在开始指导荣庭的那一年，我自己的研究计划（不是跟随别人的“项目”）是写一篇结合哲学与心理学的论文——《疗遇时刻：理心术与疗愈的多重文化交叉论述》^①。我的问题没有“学科界限”，无论是在思考上还是在写作上皆然。我不会要求学生模仿我的研究，但一定程度上，这种做学问的态度就会在指导关系上表现出来。年轻学者若不能以此为其学习的志向，必定会跟得很辛苦。反过来说，忘我的学习很快就会自行产生学问动力，让论文写作成为一种能理能论的工作。

我毋须在此为荣庭写好的论文做摘要，只要交代像这样史无前例的“双联培养博士学位”是如何进行、如何完成的，剩下的就是读者的阅读了。像这样的题目，如果你是个研究生，你要如何开始？如何写下去？如何把经历的实践工作和理论思考结合起来？

我确实只想说明这样的启动方式。也只想说，像我一样，好学者就能让知识“不假外求”地产生。在博士论文的指导关系中，指导者实际的工作只是“催生”，而不是像赶鸭子上架那样逼人进入论文写作。我很庆幸在我的执教生涯中，能在 2013 年秋季碰上像荣庭这样的学生，并且在 2015 年暑假之前完成了这场紧凑无比也史无前例的言之有物的工作。



2017 年 12 月 23 日

^① 宋文里. 疗遇时刻：理心术与疗愈的多重文化交叉论述 [J]. 哲学与文化, 2014 (41): 47-74。

目 录

Contents

1

目录

第一章 研究主体与研究方法 / 1

第一节 研究主体 / 2

一、艾滋病人群的生存现状 / 2

二、我与艾滋病研究的遭逢 / 6

三、研究主体：生病历程中的情感跌宕 / 11

第二节 研究何以可能 / 17

一、方法论层面的理论支持 / 17

二、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 18

三、具体层面的操作执行 / 21

第三节 研究伦理的深层考量 / 25

一、以知情同意为前提 / 26

二、严格遵守先无害后受益的准则 / 26

三、时刻铭记调查的严谨性 / 27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 / 29

第一节 情感社会学研究 / 30

一、情感社会学的发展历史 / 30

二、情感社会学的研究现状 / 33

三、情感社会学的未来趋势 / 41

四、情感社会学的本土化与土生化 / 43

第二节 社会学视野下的艾滋病研究 / 46

- 一、艾滋病研究的国际化 / 46
- 二、艾滋病防治的本土发展 / 51
- 三、艾滋病人群的情感研究 / 55

第三节 本书的理论视角 / 59

- 一、情感社会学理论 / 59
- 二、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 / 67

2

第三章 获得性“需要缺陷”综合征 / 69

第一节 证明自我需要的缺失 / 72

- 一、核心自我的崩解 / 73
- 二、潜在身份的失能 / 76
- 三、角色身份的污名 / 80

第二节 获益交换需要的缺乏 / 83

- 一、公平就医被拒绝 / 83
- 二、身份信息被利用 / 88

第三节 群体归属需要的缺陷 / 92

- 一、初级生活圈的变迁 / 93
- 二、单位和社区的排斥 / 101
- 三、亲朋与好友的疏离 / 105

第四节 信任需要的缺场 / 108

- 一、信任危机：预期行为带来的失落 / 109
- 二、依赖困境：信任破裂引发的退出 / 112

第五节 真实需要的缺憾 / 115

- 一、与他者的共存 / 116
- 二、与污名的遭逢 / 119

第四章 获得性“期望不足”综合征 / 125

第一节 期望状态的模糊性 / 129

一、角色选择的无奈 / 130

二、地位获得的迷茫 / 142

第二节 期望达成的局限性 / 154

一、新增范畴单元缺少同质性 / 155

二、普遍范畴阻碍清晰性 / 159

第五章 获得性“惩罚泛滥”综合征 / 165

第一节 体制领域的惩罚 / 168

一、意识形态的限制 / 168

二、符号媒介的排斥 / 172

第二节 分层系统的资本分配不均 / 180

一、布迪厄“四种资本”的尽失 / 181

二、情感资本的负积累 / 184

第六章 情感呈现 / 189

第一节 情感抑制的形成 / 194

一、失望悲伤的痛苦体验 / 194

二、羞愧内疚的强化改变 / 195

第二节 负性情感的再转化 / 200

一、置换与投射 / 200

二、升华和反向作用 / 202

第三节 情感的外指呈现 / 206

一、社团单元的愤而离场 / 207

二、范畴单元的怒而扩散 / 209

三、宏观结构的持续恶化 / 211

第七章 情感调适：存有与呈现的动力机制 / 215

第一节 存有与呈现的应对视角 / 216

一、冲突与博弈 / 218

二、结构与功能 / 221

三、互动与系统 / 224

第二节 情感调适的社会效应 / 228

一、负性情感与社会变革 / 228

二、正性情感与社会结构 / 230

第三节 研究反思 / 235

参考文献 / 237

后记 / 250

第一章

研究主体与研究方法

